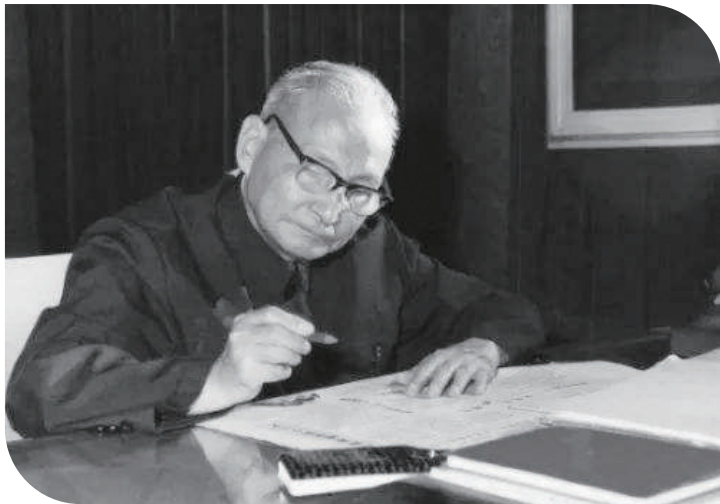


陈云怎样学哲学用哲学

□ 金冲及



为什么在同样或相似的环境中，各人的成就和贡献有大有小甚至有成有败？为什么陈云能够创造这么多常人难以企及的光辉业绩？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：他极端重视学哲学，要求人们把学哲学放在生活和工作中异常突出的地位。他的女儿回忆道：“爸爸在江西工厂‘蹲点’的时候跟我讲：毛主席之所以能够领导我们把中国革命搞成功，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，也是毛主席非常高明的地方，就是他用哲学思想培养了一代人。”“每当他讲到毛主席在延安要他学哲学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他两眼放光，非常激动。”

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滋养

陈云重视学哲学，从来不是把它当成书斋中那种脱离实际的空谈，而是出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现实需要，力求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，作为引导行动的指针。

他多次强调：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，最要紧的，是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。学习理论，“首先要学习哲学，学习正确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。如果对辩证唯物主义一窍不通，就总是要犯错误。”“学习哲学，可以使人开窍。学好哲学，终身受用。”他认为这不只是个人的问题：“全国人民把希望寄托于我们党的身上，我们有这样的责任，不能搞坏，搞坏了不是一个人、几个人的事，而是关系全国人民的得失。”

陈云谈学哲学重要性谈得最多的有两个时期，一个是延安时期特别是延安整风中，另一个是改革开放时期，都是中国共产党面对重大历史性变化的时期。为了适应这种变化，并且在变化中跨出重大的新步子，首先需要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，使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。处在这种时期，更需要把学哲学的问题提到异常突出的地位。

延安整风的基本问题是整顿三风，其中主要是反对主观主义，也就是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来总结党以往犯“左”倾错误的根源。陈云几年后在《怎样才能少犯错误》的报告中讲道：“我们怎样才能少犯错误，或者不犯大的错误呢？在延安的时候，我曾以为自己过去犯错误是由于经验少。毛主席对我说，你不是经验少，是思想方法不对头。他要我学点哲学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毛主席还是对我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。他以张闻天的经验并不少为例加以说明。第三次毛主席同我谈这个问题，他仍然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。后来，我把毛主席从井冈山到延安写的东西都找来看，研究他处理问题的方法。同时再次考虑，错误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？我得出一条结论，是由于主观对客观事物认识上的偏差。凡是错误的结果都是由行动的错误造成的，而行动的错误是从认识的错误来的。认识支配行动，行动是认识的结果。”

他后来和邓小平说过这段经历，邓小平十分赞同，说：“延安整风，反对主观主义、宗派主义和党八股，就是从根本上而不是从枝节上解决问题。”

改革开放时期，面对新的形势和大量出现的陌生问题，更要求主观认识能符合迅速变化的客观实际，这是很不容易的。陈云和许多老同志又正要退下来，对缺乏足够经验的年轻领导干部抱着很殷切的期望。于是，他再次着重强调学哲学的极端重要性。

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中共中央着手起草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，以统一全党的思想。陈云向邓小平“建议中央提倡学习，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，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”。两天后，邓小平向《决议》起草组谈了陈云的意见，并且说：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，很需要从思想方法、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。陈云也对起草组负责人说：“在党内，在干部中，在青年中，提倡学哲学，有根本的意义。”“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，思想上、工作上才能真正提高。”

把主要精力用在把握实事求是这个精髓上

陈云提倡学哲学，最看重的是什么？是实事求是，是要使主观认识符合十分复杂的、并且在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。当然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严整的理论体系，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，决不能简单化庸俗化地去对待它，那样不可能真正懂得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。前面所说陈云学习哲学时付出的那种艰苦努力，充分说明了这一点。但必须把最主要的精力用在把握它的精髓上，那就是实事求是，使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。陈云常说的“不唯上，不唯书，只唯实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
他回忆道：“在延安的时候，我曾经仔细研究过毛主席起草的文件、电报。当我全部读了毛主席起草的文件、电报之后，感到里面贯穿着一个基本指导思想，就是实事求是。”实事求是，就得坚持一切从

实际出发，“只唯实”。在作决策、采取行动时，必须先进行切实而周密的调查研究，把各方面的事实真正弄清楚，经过分析，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，才能做到对症下药。陈云把它看作做好工作的先决条件。他说：“领导机关制定政策，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，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。”“难者在弄清情况，不在决定政策。”这是他在工作中取得成功的秘诀所在。

为什么陈云领导经济工作能取得那么大的成功？为什么其他人视为畏途的许多“老大难”问题，在他手中常能得到成功解决？为什么他说的话和做的事总是那样实在并且切中要害？原因就在于他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正确的，他的决策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作出的。而那些习惯于拍脑袋决策、拍胸脯保证、最后拍屁股走人的干部，同他的做法截然不同。对此，他语重心长地叮嘱：“有的同志天天忙于决定这个，决定那个，很少调查研究实际情况，这种工作方法必须改变。”

掌握交换、比较、反复这个辩证法

从实际出发，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并不容易。客观事物是复杂的，常常包含相互矛盾的多个侧面，并且不断发生变化，不是一眼都能看清楚的。人们对事物的认识，通常需要经过一个在实践中由浅入深、由表及里的过程，决不能把走马观花时获得的一点粗枝大叶的印象、甚至一些道听途说的话当作客观实际的全部，而且还自以为是，那样没有不跌跤的。

人们常说陈云处事“稳”和“细”，这确是他的特点。他曾说过：“我们犯错误，就是因为不根据客观事实办事。但犯错误的人，并不都是没有一点事实根据的，而是把片面当成了全面。”为了减少和避免认识客观事物的片面性，陈云提出了“交换、比较、反复”三种方法。交换，就是互相交换意见。两人各看到一面，都是片面的。如果交换一下意见，就会得到全面的符

合实际的认识。比较，是对各种不同意见进行多方面的比较，不仅要看到正面，还要看到反面；不仅要听正面的意见，也要听反面的意见，这样才能使判断更正确。反复，就是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，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，对关系重大的问题尤其应当这样。他说：“不唯上，不唯书，只唯实”是唯物论，“交换、比较、反复”是辩证法，合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。

陈云对重要问题的判断和决策，从不简单地照抄套用那些现成的方案，而是敢于进行创造性的探索。这种探索总是慎之又慎，力求做到最切合实际状况。他在拿定主意以前，会请别人补充情况或提出各种分析看法，然后他把方方面面的情况综合起来再思索，把思索出来的东西讲给别人听，征求意见，直到修改满意为止。一旦把事情弄清了、看准了，就下最大的决心，顶住各种压力，坚持贯彻到底，做出结果来。

可以看一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53年，陈云如何处理异常棘手的粮食统购统销问题，作为例子。那时候，粮食供销在全国范围内出现紧张，不法私商的投机活动又十分猖獗，粮价上涨，全国刮起一股抢购粮食之风，人心开始浮动。负责财政经济工作的陈云说：“我现在是挑着一担‘炸药’，前面是‘黑色炸药’，后面是‘黄色炸药’。如果搞不到粮食，整个市场就要波动；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，农民又可能反对。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，都是危险家伙。”怎么办？他广泛听取意见后，考虑了八种处理办法，如只配不征、只征不配、原封不动、统购统销等，慎重地比较每一种办法有什么利、有什么弊，最后得出结论：根据现有情况，处理办法只能是在农村实行征购、在城市实行定量配给，合称为“统购统销”。为了照顾农民的利益，在征购数量和牌价等方面都作了恰当的规定。事实证明，在物资十分缺乏、经常供不应求的情况下，为了保障居民能得到起码的生活必需品，这是当时唯一可行的办法，收到了预期的效果。

正是根据自己一生成功和遭受挫折的切身经验，这位老人在晚年一再叮嘱后人：“学马克思主义哲学，是思想上的基本建设。”1989年9月，他又写信给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说：“我最近考虑一个问题，就是应该组织中顾委常委和在京委员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。其目的有二：一是我们这些老同志有丰富经验，但需要进一步提高理论水平；二是带动新干部乃至全党同志都来学习哲学。”可见，他始终念念不忘地嘱咐后来者（包括“新干部乃至全党同志”）都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，认为这是“思想上的基本建设”。这些嘱咐对于今天的党员干部来说，无疑是要牢牢记住的。

（摘自《人民日报》2015年6月15日，原题为《为党和人民事业学哲学用哲学——陈云学用哲学启示录》）

□ 刘 颖



党旗的诞生历程

□ 王婧倩

中国共产党党旗是党的象征和标志之一。我们今天看到的党旗并非自党的成立之日起就存在的，党旗从无到有直至定型经历了较长时间，其过程与党的发展壮大的历史密切相关。

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，各地党组织模仿俄共（布）旗帜的式样，以镰刀斧头作为标识，具体规格式样不尽相同。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到南昌起义时，因为形势的要求，中国共产党打出国民党的旗帜。大革命失败后，毛泽东在八七会议及其他场合多次强调：“国民党的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，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。”“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，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”。

1927年9月，毛泽东在湘赣边秋收起义中提出，应该打出一面工农革命军的旗帜，并要何长工负责设计。这面旗帜用鲜艳的红布制作，在中央缝着一个黄色五角星，在五星的中心是镰刀和斧头，白色旗套上写着“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”字样。从此，我们党和军队有了自己的旗帜。

1927年10月15日，中共南方局、广东省委联席会议通过《中共广东省委第十四号通告：最近工作纲领》，明确指出：“废除青天白日旗，改用红旗，以斧、镰为标志。”基本框定了党旗的轮廓和构成要素。1933年4月，中共中央决定，把党旗党徽中的“斧头”图案调整成为“锤子”图案。由于战事频繁，这项决定未能全面贯彻执行。此后，在党旗的有关表述与制作使用中，出现“斧头”和“锤头”混用的现象。1945年4月，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，会场上的六面党旗鲜艳夺目。这是我们党第一次在全国代表大会上悬挂党旗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

主任的杨尚昆非常关心党旗的问题。1950年6月，他就党旗问题致信刘少奇，并附三套党旗图案及说明。同年，中共中央组织部拟定党旗制作方案：“旗面为红色，长方形，长与高三与二之比，旗面左上方缀黄色镰刀斧头，旗杆套为白色。”此后由于政治运动接连不断，关于党旗规范式样一直没有正式统一规定。

直至改革开放后，党旗的问题才被重新提上日程。1996年9月21日，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《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制作和使用的若干规定》，正式定下党旗规范：“中国共产党党旗为旗面缀有金黄色党徽图案的红旗。中国共产党党徽为镰刀和锤头组成的图案。”从此，中国共产党党旗有了统一明确的规范。2002年11月，党的十六大通过的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专门写入“党旗党徽”一章，对党徽党旗图案的性质、制作和使用作出明确规定。

（摘自《中直党建》2018年第7期）

叶挺的人党申请书

1946年3月4日下午，叶挺被中共中央从国民党军统局的监狱里营救出来。在出狱后的第十个小时，他就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，这也是他继22年前在莫斯科向中共旅英支部写过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后，直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的第二份入党申请书。他是这样写的：

毛泽东同志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：我已于昨晚出狱。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，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，在你们的领导之下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。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，并请答复。

叶挺寅微（签字）
叶挺完成了这份写在“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用笺”上的申请书之后，精神上感到轻松了许多。早晨6点钟，代表团人员起床以后，他便拿了这张信纸，先到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办公室兼卧室，交给邓颖超看。邓颖超看过之后，又高兴地和叶挺一起找到主持工作的南方局副书记董必武，请他过目。董老看后，当即表示

欢迎叶挺的申请，并交代机要室，“发加急电报”。

3月7日早晨，当叶挺从周恩来手里接过那份沉甸甸的回电，恭谨捧读的时候，最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他向往已久的那个亲昵的称谓——“亲爱的叶挺同志”。亲爱的叶挺同志：

五日电悉。欣闻出狱，万众欢腾。你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二十余年的奋斗，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。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，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忱。

中共中央
3月7日

叶挺急不可耐地寻找着他所需要的那句话。当他的视线跳过几行字，在“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”那句话上停下来时，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。

（摘自《百年潮》，2019年第9期）

队一起离开。

第三次路过家门是1930年秋天。当时吴西受党组织委派，从香港护送中央代表邓岗（即邓拔奇）回右江找红七军，传达党中央的决议案。他们打扮成商人，搭船经北海回广西，路过渠黎圩附近时，遇到堂叔吴绍光。吴西请堂叔为他们带路并嘱咐其保密，不能将自己回来的消息告诉其他人。因任务在身，行程紧张，虽说家门和亲人就在眼前，吴西却只能回头看看村边古榕即匆匆而过。吴西曾说：“谁不爱自己的家乡？但是，革命者应该以四海为家，为了革命，祖国处处都是家。”他抛开离愁，第三次过家门而不入，一路护送邓岗平安到达右江平马镇，找到红七军司令部，完成了任务。

（摘自《机关党建研究》2019年第2期）



吴西三过家门而不入

百岁将军吴西，一生戎马倥偬，南征北战，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解放事业立下汗马功劳。他早年投笔从戎，辞去稳定教职，瞒着家人参加革命。1929至1930年间曾三过家门而不入，展现了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艰苦奋斗、忠贞不屈的光辉形象。

吴西第一次路过家门是1929年8月。此时，他已从广西左县高小辞职，以到南宁求职的借口离开家乡，

投身到广西革命的洪流中。8月初，吴西从南宁乘船溯左江而上，赴边陲重镇龙州招兵组建独立营，为日后的龙州起义积蓄革命武装力量。一行人行船到扶南啼窑码头，决定停泊整休。啼窑离吴西家乡渠黎圩三哈村只有十多里路，一个多小时就可到家。此时

吴西已离家几个月，其间未给家中送去任何音讯。虽然心里惦记着家人，但为了不暴露革命，他仅稍作停留，查看了市场买卖情况，等船修好后继续航行，遥望家乡而过。

第二次路过家门是1930年3月24日。龙州起义失败后，红八军二纵队

和军部直属队一千多人辗转宁明、绥禄，到达扶南县离家仅有二三里地的渠黎圩。3月24日是圩日（即赶集日），吴西正忙着筹措部队生活物资、组织人员写标语、登台演讲时，被来赶圩的父亲、母亲和姑母看到。他们担心吴西的安全，哭着劝他回

家，安稳过日子。吴西理解他们的担忧和心情，却也无法放弃自己的革命理想，只得一边坚持“革命不成功不回家，共产党的道路我是走定了”，一边婉言劝慰家人，再三承诺“等革命成功了再回来见你们”。吴西最终选择了与亲人面对面对决，随着大部